



周文化统治的历史格局在“东土”的形成

曹 斌

关键词：西周王朝 东土 周文化 统治 历史格局

KEYWORDS: Western Zhou Dynasty “Eastern Territory” Zhou Culture Governance
Historic Pattern

ABSTRACT: The “Eastern Territory” here refers to the present-day Shandong area, which was completely ruled by the Shang Culture in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he Shang Culture declined and the aboriginal cultures got developing.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after conquering the Shang Dynasty, King Wu began to enfeoff aristocrats of his own royal clan and marriage clans, which were mainly that of the Ji and Jiang Families, and members of the royal clan of the downfallen Shang Dynasty, in the “Eastern Territ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Zhou court started punitive expeditions against the aboriginals, in order to establish governance in this territory. To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Zhou court spread the Zhou Culture to the entire “Eastern Territory” through a series of ritual reforms, and the aboriginal nobles also accepted the rule of the Zhou Dynasty. From this time on, the historic pattern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Zhou Culture in the “Eastern Territory” was finally formed.

西周王朝通过周初的分封，开始了国家化的道路，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包括周文化进入“东土”^[1]，并随着周王朝统治力量的强大，不断确立在东土的统治地位。此前学界对于“东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商时期以及商文化的进退上，对于西周时期周文化在该地区的演进问题涉及较少^[2]。本文在梳理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结合金文和传世文献材料，讨论西周王朝国家化历程中周文化的统治地位在“东土”的确立过程，并尝试重建这一时期“东土”的历史态势。同时，希望本文研究涉及的西周王朝的国家化历程、统治政策的变化与统治秩序的确立、封国疆域与区域政治等，对于学界相关问题的研究能有所裨益。

一、商代“东土”的文化态势

在周文化进入山东地区之前，“东土”一直是商文化的分布区。商文化与土著文化此消彼长，构成了西周之前该地区的主要文化态势。

（一）早商时期商文化的分布

山东地区在二里冈下层文化时期，还处于岳石文化固守的地区。但是在进入二里冈上层文化之后，山东地区也和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开始受到商文化的入侵。在鲁南的前掌大^[3]、北辛^[4]、尹家城^[5]、南关^[6]、天齐庙^[7]、潘庙^[8]等遗址均发现有典型的商文化遗存。而这其中，前掌大遗址的等级似乎最高，在遗址中心及其周围的吕楼、大康留都

作者：曹斌，北京市，10087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发现罍、觚、爵这样的铜礼器^[9]。此外，鲁西南的安丘堽堆遗址也发现有此时期典型的商文化遗存^[10]。鲁东南商文化的进入要略晚于以上两个地区，据新近发表的材料，费县曹车遗址、苍山刘家堡、莒南虎园水库、沂源东安故城等都散见白家庄上层至殷墟文化一期的商文化遗物^[11]。商文化既能控制鲁南地区，向西北挺进至沂水流域并非不可能。

鲁北地区此时期材料最丰富的是大辛庄遗址，该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出土了大批遗物^[12]。本阶段，大辛庄遗址似乎一直是商文化在鲁北的中心统治区。从二里冈上层文化阶段到殷墟文化一期，一直如此。2010年发掘的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的M139，出土有14件铜器，除鼎、鬯、壶等外，还出有大型铜钺和已知最早的一件铜觶^[13]。其西的茌平南陈庄遗址也有此时期典型的商文化陶器发现^[14]，其东的桓台前埠遗址、唐山遗址^[15]以及近海的阳信李屋遗址^[16]亦发现有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的遗存。关于商文化分布的东界，王恩田先生曾指出可至青州的萧家遗址^[17]。

（二）晚商时期商文化的进退

鲁南地区此时的商文化遗存开始减少，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的遗存还有发现，殷墟文化三期、四期的遗存已十分稀少，特别是可明确为殷墟文化四期的遗存几乎不见。此前遗物还比较丰富的尹家城遗址、天齐庙遗址和南关遗址均不见晚商遗存。潘庙遗址有一些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或略晚时期的陶器，更晚的器形并未发现。前掌大遗址只有居址材料中还出有少量殷墟文化二期、三期的陶器^[18]和个别铜器^[19]，明确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的器物基本不见。凤凰台遗址有少量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或略晚时期的遗存^[20]。泗水流域原定在商末的一批遗址，已有学者指出其年代下限均可进入西周^[21]。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其中位于鲁南的遗址基本均是西周早期的而非商末。鲁西南的安丘堽堆遗址仍有少量本阶段遗物的发现，但是简报

定在殷墟文化四期的器物都是地层所出，无明确单位。据鬯、觥等器物足部绳纹已经到底的特征看，这些器物的年代可能已经进入西周，也就是说安丘堽堆遗址并没有殷墟文化四期典型单位的发现。有学者近年对殷墟所出商王朝征夷方的甲骨文，特别是帝辛十祀的大规模征夷军事行动考证后，明确指出属第五期的卜辞所见夷方与山东岛夷并无多大联系，其所指应为淮北^[22]。而考古所见，鲁南地区在殷墟文化晚期以前还是商王朝的东南边界，但是从殷墟文化三期开始遗址凋零，至殷墟文化四期已不属商王朝的地界。

鲁北地区的情况与鲁南有所不同。首先，商文化在控制范围未缩小的前提下，统治还有所加强。就在青州苏埠屯墓地，出现了晚商除殷墟商王陵之外的唯一一座四条墓道大墓^[23]，墓中出土的大型铜钺上有族徽“亚醜”，墓主很可能是商王在东土任命的具有军事统率权的君长，商王朝依仗其来抵御夷人的西进，从而确保对渤海沿岸和莱州湾盐业的占有。苏埠屯墓地的存在也说明此时期商文化依然没有真正跨过潍河，与上一阶段基本维持在同一边界。其次，鲁北与商王朝联系更加紧密，并出现许多族徽铜器，族系关系复杂。大辛庄遗址继续繁盛，仍然有此阶段铜器墓的发现，并发现有族徽“𠄎”。就在距大辛庄不远，济南市区的刘家庄发现有晚商时期的墓地，出土有族徽“役”^[24]。长清区的小屯遗址1957年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卣、觶都是殷墟文化四期的器形，卣上有铭“举祖辛禹亚预”^[25]，出现了复合族徽“举”“亚预”。苏埠屯墓地M1出有族徽“亚醜”，M8的铜容器上有族徽“融”^[26]，1931年出土的铜器铭文有“藝”氏^[27]。潍坊后邓村清理了一座残墓，出土铜卣、觶、爵有族徽“𠄎”^[28]。在前一阶段有商文化遗存分布的桓台，此时期也有史家遗址的发现。该遗址除有环壕、房基、水井等居址材料外，还清理过几座墓葬，

出土的商代铜容器上有族徽“举”、“鱼”、“箕”等^[29]。而在比桓台更靠北的滨州兰家遗址也发现了此时期的陶器和铜器材料，1件铜卣上还有族徽“甶”^[30]。惠民大郭遗址发现一座墓葬，出土的铜铙、方彝、戈上有族徽“戎”^[31]。再次，遗址数量众多，并出现一批与盐业有关的遗址群。除内陆的章丘城子崖^[32]、邹平台头和东台遗址^[33]、寿光桑家庄遗址^[34]、桓台前埠、唐山等遗址^[35]，近海还有刘集遗址群、北赵遗址群、坡家庄遗址群、南河崖遗址群、东北坞遗址群、大荒北央遗址群、双王城遗址群、王家庄遗址群、央子遗址群等一批盐业遗址群^[36]。以上说明晚商时期商王朝在其他地区全面退缩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对鲁北地区的重点控制。

鲁东南地区只有沂水信家庄发现有铜觚、爵和陶簋各1件^[37]，由于发表的图片不清晰，大致判断铜觚、爵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前后，陶簋为本地文化的产物。有学者新近公布该地区晚商遗存28处^[38]，但依旧罕见典型的商文化陶片，出土铜器除费县双丘遗址采集的铜爵可早至晚商外，其余可能均已晚至西周早期。从区域系统调查的材料看，鲁东南此时期可能是以土著文化为主^[39]，也就是说此时期商文化在鲁东南地区的影响已明显衰退。胶东半岛是以珍珠门^[40]和芝水二期遗存^[41]为代表的夷文化控制区，其与鲁北的商文化以潍水为界，东西对峙。

二、西周前期“东土”的历史格局

周初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周人灭商，周革殷命成为天下共主，于是整个“东土”的历史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由于以“小邦周”而取天下，武王灭商之后即大举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现已知分封于鲁南地区可与考古材料相印证的有鲁国和滕国，据《左传》记载均为“文之昭也”，为姬姓封国。在滕州的庄里西墓地发现有滕

侯铜器^[42]，这里也被认定为滕国的墓地。就在其附近还发现滕国故城^[43]，因此庄里西一带为滕国的始封地所在。西周前期的鲁国遗存还未发现，但是在兖州李官发现有“索氏”铜器^[44]，由于文献明确记载“索氏”为周初封于鲁的“殷民六族”之一，西周后期的鲁故城内也分区埋葬着殷遗民墓葬和周人墓葬，因此鲁国的始封地极有可能就在现今兖州范围内。而见于文献的封于鲁西南的曹、邾、郟等封国也都与鲁、滕类似，均为姬姓封国。在封建亲戚之外，周王朝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措施巩固统治，即册封殷遗民贵族。不仅“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还将商末叛商投周的贵族加以册封。如文献中所记封箕子于朝鲜，封微子于宋；墙盘记载的对微氏烈祖的任命，以及考古发现册封于涇阳高家堡的殷遗民大族戈氏等。而鲁南地区的前掌大墓地也正是此类性质的遗存，大约在商末，殷商大族——“史”氏鉴于商纣无道，可能和其他大族一样叛商投周，在周初重新得到了周王朝的册封，并被委以重任镇守此地^[45]。由于在商末，鲁南地区已经不属于商文化的控制区，因此周王朝很顺利地分封鲁、滕等姬姓封国，册封“史”族至此，控制了鲁南地区。

目前所见西周早期偏早阶段鲁北地区的周文化陶器，在考古学上虽不能细化到“段”的差别，但是可以感觉时代略晚于鲁南西周最早阶段的周文化陶器。这是因为周王朝对于鲁北地区的控制是在另一件重大军事举措后才基本完成的。

在周初，由于周王朝刚刚取得天下，东夷叛乱不断。鲁北在晚商时期又是商王朝重点控制的地区，族际关系复杂，并且是商王朝盐业的主要供给区。因此，成王时期周王朝对此地进行了大举征讨。除文献记载外，还有成王时期涉及伐东夷的壘方鼎、旅鼎、保卣等铭文可以佐证。其中壘方鼎谈及翦灭“葷”、“薄姑”的战事，旅鼎、保卣分别

提到“伐反夷年”和“及东国五侯”之事。因此之前兴盛的遗址都迅速由盛转衰，苏埠屯墓地不再见到带墓道大墓，大辛庄或可延续至西周，但遗存数量已急剧减少，马安墓地^[46]的墓葬数量同样急剧减少。齐国的分封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发生的。分封以征伐见长的太公至此，目的就是为了稳固“东土”的局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东夷。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昌乐、青州、章丘、济南、淄川一带都有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周式陶器的出现，临淄大城东北部的东古村村北还发现有数件西周初年的铜车马器；临淄河崖头发现三座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铜器墓，其中1件陶簋的底部还有“侯”字^[47]。所以营丘的范围可能也就在北到临淄、南到淄川、西至济南、东至昌乐这样一个大致的范围以内。此外，在莒国故地，齐国最晚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设立了边防。太公封庶子于此地，并筑一座小城保护贵族墓葬和祭祀区^[48]。鉴于如此严密的防守，西周前期齐国的北界可能也就大致在此。至于影响所及，滨州甚至庆云、乐陵一带也在其范围之内^[49]。而就在齐国之西，有“逢”国在西周前期一直居此，其墓地发现于济阳刘台子^[50]，所以齐国的西北界也不逾济阳一带。关于齐国的东界目前无法确定，但是即便是影响范围，也不可能越过前一阶段商、夷对峙的淮河流域。文献记载中，齐国在分封之初就有“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的事件。从考古学文化上看，在西周早期更多的也是夷文化对于鲁北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才减弱。胶东半岛晚商时期是传统的夷文化固守的地区，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周文化对其地的影响还比较有限，表现在物质文化上只是绳纹装饰的出现，典型的周式陶器基本不见。这也涉及到胶东半岛地区历史格局转变的时间问题。

晚商时期夷人势力强大，在西周早期仍不断反叛。在康、昭时期的铜器铭文中

许多关于继续征伐东夷的记载，如鲁侯尊“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甗鼎“王令遣捷东反夷”、小臣谏簋“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保员簋“昏伐东夷”、甗鼎“惟王伐东夷”的记载。以上部分铜器的器形虽可晚至昭王时期，但是铜器铭文多为追述，这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多在康王时期。铭文所提“东夷”，由于此时鲁北内陆地区已分封有齐国，可能多指胶东半岛的夷人部族。从考古材料看，胶东半岛典型周文化因素的出现也是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这在归城遗址表现得最为明显^[51]，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开始出现铜器墓。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有小刘庄、姜家、庄头^[52]铜器墓的发现，小刘庄墓出土的启尊、启卣记载随昭王南征之事，可见至迟在昭王时期，胶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已纳入了周王朝版图之内，其上层统治者是接受周王朝统治的，此时期的归城遗址可能就是文献中的莱国所在。这种统治，还可东至海边的威海和荣成地区，此地同样有西周早期偏晚铜器墓的发现^[53]。而胶县西庵西周早期车马坑和西周中期偏早阶段铜器墓的发现^[54]，一方面说明周王朝对于胶东半岛的控制已向南扩展至此地；另一方面说明鲁东南大部分地区可能是在西周前期不属周王朝的控制地带，北边周文化因素的侵入要绕经鲁北才能迫近鲁东南地区，西边则只能通过鲁南地区东进至苍山附近。

目前鲁东南只有兰陵东高尧发现有铜器和族徽^[55]，原简报将这批铜器的时代定在商代，但从出土铜甗、簋、尊的形制看，都是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器形，出土的细体铜觶多见于西周早期的丰镐地区但在殷墟罕见。同样的情况还有平邑洼子地、兰陵密家岭、兰陵晒米城遗址^[56]，出土的铜器应该都是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平邑毗邻鲁文化分布区，兰陵晒米城在滕州史国东南，并出土有“史”铭铜器残片，说明周王朝的势力在周初可能已经渗透到平邑、苍山一线，这可以

作为周文化在鲁东南东部边界的一个证据。从以上可知，鲁东南地区殷墟文化晚期是土著文化控制区，苍山以东的大片地区并不见西周前期考古遗存，与文献和金文中关于莒国地望在鲁东南地区的记载不符，这可能是鲁东南地区考古工作开展较少，与莒国相关的遗存尚未发现；但更可能是莒国在西周前期并不在此地，鲁东南大部分地区依旧是土著文化的控制区，只是这些土著文化的绝对年代进入西周与否我们尚无法确认。

三、西周后期“东土”的历史格局

在西周前、后期之交，“东土”的历史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上述诸如前掌大墓地、北沈马遗址^[57]、刘台子墓地等都迅速消失，连续发展的诸如陈庄遗址^[58]的性质由军事要地变为一般性遗址。另一方面，一批以周文化因素为主导的遗址开始兴起，周文化覆盖整个“东土”，全境文化面貌呈现出很强的一致性。

鲁南地区在原先的前掌大墓地之西有薛故城兴起，据现有材料可知，小城在西周后期之始已经修建，城内也发现了此时期的陶器^[59]。鲁故城遗址出现西周中期偏晚阶段的居址和墓葬，并发现了大量西周晚期以及更晚的材料，如城垣、城门、大型建筑、砖瓦、手工业作坊等^[60]。鲁故城是西周后期以来鲁国都城的所在地，学界几无争议。此外，围绕着鲁故城遗址，在兖州还分布着西吴寺、尹家城和六里井等一般性遗址^[61]，文化面貌虽有些许差异，但呈现出的一致性主要的，均以周文化因素为主导。而春秋初年小邾国始封于枣庄地区，2002年在枣庄东江发掘了小邾国墓地，6座墓葬分属第一代国君邾友父及以下两代的小邾国国君及其夫人^[62]。

鲁北地区最重要的封国无疑是齐国。现知的临淄齐故城一般认为是周厉王时期齐献

公所迁的临淄所在，而齐国在此阶段的活动中心也就在临淄一带。陈庄遗址的性质发生了明显变化，城址开始废弃且不见修补，只是在西周懿王、孝王、夷王时期齐国内部动荡之时才重新受到重视，并在之后埋葬有周王委任的军事重臣。因此，西周后期齐国的北界已远远突破高青一带。《史记·齐太公世家》记成王时太公被赐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领土和权力。而文献中的齐国以渔盐闻名，此时期齐国可能已经控制了渤海沿岸甚至莱州湾的盐业生产。但是南界由于泰沂山脉的存在，不可能有很大的拓展。在西南界方面，济南王府遗址、唐冶遗址^[63]虽以周文化因素为主导，但是本地文化因素同样有一定比例，可能已是齐国的西南边界。再西就是长清仙人台遗址^[64]，仙人台墓地几座大墓葬俗上流行腰坑，坑内有殉狗，葬具流行独木棺，且铜器铭文均有“郛”。就在仙人台西南仅10公里的石都庄还发现有同样出“郛”国铜器的墓葬^[65]，但墓葬等级低于仙人台墓地。可见，长清一带此时是郛国所在地。由于郛国墓地的下限在春秋晚期，而石都庄南2.5公里即是战国齐长城所经之地长城村，推测此地入齐境可能是在战国时期。至于齐国此时期的东南界，至少在临朐一带。临朐泉头村发现的两座春秋早期墓葬都出有齐国铜器，墓甲出土的铜匜还是“齐侯子行”所作。此外，同出的曾国、郟国铜器^[66]还显示了此阶段封国间文化上的频繁互动。但是齐国的东界可能依然无法越过潍河，齐国跨过潍河可能已是齐襄公八年（公元前690年）纪侯为齐所迫，“大去其国”之后的事。

胶东半岛的归城城址此时已经修建，在和平村、南埠村发现多座高级贵族墓，并出有纪国的滕器^[67]，结合文献可知此地应是莱国都城所在，是接受周王朝统治的。但统治的下层人群仍是夷人旧族，东营周家村土

著贵族墓^[68]的发现就是例证。与莱国相邻的是纪国，烟台上乔村、莱阳前河前村纪侯铜器的发现^[69]，表明莱阳至烟台一线可能属纪国所有。由于纪侯潜齐致使齐哀侯被烹，两国关系开始异常紧张，纪国势弱被迫不断东退，所以胶东半岛的莱国以南以东地区可能才是纪国的核心统治区所在。而乳山南黄庄和即墨北阡土著贵族墓的发现^[70]，说明胶东半岛的上层贵族虽已接受周王朝统治，但是土著贵族的实力仍很强，下层平民则多为东夷旧族。

鲁东南地区在西周后期开始出现可辨识时代和文化属性的陶器材料，同时相应的遗址基本以周文化因素为主导。姑子坪遗址具有地方特色的葬俗和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71]，说明沂源一带可能与莒国的关系更近，而距齐国较远。日照掀齐园和崮河崖遗址出土的鲁东南地区时代较早的陶器和铜器，以及西大庄铜器墓的发现^[72]，也都为寻找此时期莒国的统治核心区提供了线索。但是从以上遗址均以周文化因素为主导的现象看^[73]，其上层贵族无疑都接受周王朝的统治。在西周后期，鲁东南地区已明确划入了周王朝的版图。而防故城城址以及遗物的发现^[74]，说明鲁国的东界就在此地。

四、周文化统治格局的形成

从以上对于早商时期、晚商时期、西周前期、西周后期四个阶段历史格局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商文化在“东土”的退出、周文化的进入以及周文化统治地位的确立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晚商时期，商文化在鲁南地区呈现出明显的退缩之势，特别是殷墟文化四期阶段，基本不见商文化的分布。鲁北地区尽管商文化的控制有所加强，但是内陆地区的地方化现象依然明显。鲁东南和胶东半岛保持了相对的独立，都是土著文化控制区。

但是在进入西周后，周文化开始迅速渗

透入“东土”。西周前期周王朝在“东土”分封姬姓封国、姜姓封国以及册封殷商大族。而无论是姬姓封国亦或姜姓封国，均赐有殷遗民。因此，西周前期“东土”有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本地文化因素、夷文化因素、混合型文化因素，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商文化因素，所占比例只在胶东半岛不具绝对优势。尽管周文化因素普遍出现，历史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动，政治上的统治局面基本形成，但周文化的统治地位尚未形成。

进入西周后期，随着周王朝的强大以及一系列改革^[75]，周文化因素开始主导“东土”。姬姓封国控制区的鲁南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鲁故城的殷遗民普遍采用周式器物。姜姓封国控制的鲁北地区，由于齐国“因其俗、减其礼”的统治政策，本地因素仍占一定比例，但是周文化因素明显已居主导地位。同是姜姓封国控制的胶东半岛，上层统治者都是以周文化为主导的，土著贵族和下层平民遗存虽然本地文化因素浓厚，但周文化的影响同样明显。在鲁东南地区周文化开始强势进入，尽管仍有一定比例的本地文化因素，但是周文化从进入伊始就占据主导地位。从西周后期铜器师寰簋、史密簋的铭文来看，齐师和纪国、莱国的军队还要跟随周王指派的统领出征。师族簋铭文还揭示了“旻”被周王派到齐国作战的史实，引簋更是直接揭示出齐国动荡之时，周王直接任命引“更乃祖鞮司齐师”。《左传·僖公十二年》也记管仲说齐国“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礼记·王制》云：“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君。”杨伯峻注：“齐侯爵为次国，二卿为天子所命，则国氏、高氏也，为上卿”。因此，无论姬姓封国还是姜姓封国，在西周后期和春秋初年都是接受周王朝直接统治的，周文化也控制了整个“东土”。至此，周文化统治的历史格局在“东土”形成。

至于“东土”历史格局的再次变动，就

是自齐桓公始，大国争霸格局的形成，此已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附记：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7XN1010）。

注 释

- [1] 《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东土”大致相当于今天行政区划的山东地区或学界常指的海岱地区。
- [2] 邵望平：《考古学上所见西周王朝对海岱地区的经略》，《燕京学报》2001年第2期。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 [5] 山东大学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 [6]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邹县南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 [7]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泗水天齐庙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4年第12期。
- [8]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 [9] 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州市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93年第6期；《山东滕州市薛河下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考古》1996年第5期。
- [10]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山东菏泽安丘堽堆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见《考古学研究》（八），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1] 刘延常等：《鲁东南地区商代文化遗存调查与研究》，见《东方考古》第11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 [12] a.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b.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大辛庄遗址1984年秋试掘报告》，见《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c.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
- [13]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大辛庄遗址139号商代墓葬》，《考古》2010年第10期。
- [14]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省茌平县南陈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 [15] 燕生东等：《桓台西南部龙山、晚商时期的聚落》，见《东方考古》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3期。
- [17] 王恩田：《山东商代考古与商史诸问题》，《中原文物》2000年第4期。
- [18] 同[3]。
- [19] 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州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94年第1期。
- [20]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凤凰台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 [21] 燕生东、王琦：《泗水流域的商代——史学与考古学的多重建构》，见《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 [22] 李发：《殷卜辞所见“夷方”与帝辛时期的夷商战争》，《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
- [23]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 [24] 方辉：《商王朝对东方的经略》，见《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
- [25]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 [2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 [27] 祈延霏：《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
- [28] 曹元启、单煜东：《坊子区院上遗址发现商代青铜器》，见《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 [29] a. 韩明祥：《山东长清、桓台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b. 光明等：《桓台史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

- 《中国文物报》1997年5月18日第1版。
- c.张连利等：《山东淄博文物精粹》，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 [30] a.王思礼：《惠民专区几处古代文化遗址》，《文物》1960年第3期。
 B.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
- [31] 山东惠民县文化馆：《山东惠民县发现商代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3期。
- [32] 傅斯年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 [33]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平县文管所：《山东省邹平县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
- [34] 潍坊市博物馆：《山东潍坊地区商周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9期。
- [35] 同[15]。
- [36] 燕生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文物出版社，2013年。
- [37] 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出土商代铜器》，《考古》1990年第8期。
- [38] 同[11]。
- [39] 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地区系统区域调查的新收获》，《考古》2002年第5期。
- [40] a.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山东长岛县史前遗址》，《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b.王锡平：《胶东半岛夏商周时期的夷人文化》，《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
- [41]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市博物馆：《烟台芝水遗址发掘报告》，见《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 [42] a.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发现滕侯铜器墓》，《考古》1984年第4期。
 b.杜传敏等：《1989年山东滕州庄里西周墓发掘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期。
- [4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
- [44] 郭克煜等：《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文物》1990年第7期。
- [45] 曹斌：《前掌大墓地性质辨析》，《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
- [46]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马安遗址的发掘》，见《东方考古》第5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 [47] a.齐国历史博物馆：《临淄文物集萃》，齐鲁书社，2002年。
 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第460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 [48] 曹斌：《莒国小考》，《东岳论丛》2015年第3期。
- [49] a.滨城文化管理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五处古遗址的调查》，《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b.山东德州市文物管理室：《山东乐陵、庆云古遗址调查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1期。
- [50] a.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组等：《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年第12期。
 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第12期。
- [51] a.李步青、林仙庭：《山东黄县归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91年第10期。
 b.中美联合归城考古队：《山东龙口市归城两周城址调查简报》，《考古》2011年第3期。
- [52] a.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
 b.王锡平等：《山东黄县庄头西周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 [53] a.郑同修等：《山东威海市发现周代墓葬》，《考古》1995年第1期。
 b.威海市博物馆、荣成市文物管理所：《山东荣成市学福村商周墓葬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9期。
- [54] 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胶县西菴遗址调查试掘报告》，《文物》1977年第4期。
- [55] 临沂文物收集组：《山东苍山县出土青铜器》，《文物》1965年第7期。
- [56] 同[11]。
- [57] 任相宏等：《淄川考古》，齐鲁书社，2006年。
- [5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考古》2010年第8期；《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2期；《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存发掘简报》，见《海

- 岱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 [59]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故城勘探试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26日第1版。
- [6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 [61] a.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西吴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
b. 同[5]。
c.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六里井》，科学出版社，1999年。
d.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0年泗水尹家城遗址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 [62] a. 李光雨、张云：《山东枣庄春秋时期小邾国墓地的发掘》，《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5期。
b. 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枣庄市东江周代墓葬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 [63] a.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南王府遗址发掘报告》，见《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年。
b.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唐冶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 [64]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长清仙人台五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
- [65] 昌芳：《山东长清石都庄出土周代铜器》，《文物》2003年第4期。
- [66] 临朐县文化馆等：《山东临朐发现齐、胸、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年第12期。
- [67]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
- [68] 唐录庭等：《山东黄县东营周家村西周墓清理简报》，见《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 [69] a. 山东省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烟台市上芥村出土夙国铜器》，《考古》1983年第4期。
b. 李步青：《山东莱阳县出土己国铜器》，《文物》1983年第12期。
- [70] a.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山东乳山县南黄庄西周石板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4期。
b.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等：《山东即墨市北阡遗址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11期。
- [71]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沂源县姑子坪遗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1期；《山东沂源县姑子坪周代墓葬》，《考古》2003年第1期。
- [72] a. 杨深富：《山东日照固河崖出土一批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7期；《山东日照市周代文化遗存》，《文物》1990年第6期。
b. 莒县博物馆：《山东莒县西大庄西周墓葬》，《考古》1999年第7期。
- [73] 曹斌：《鲁东南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文化谱系研究》，见《北方民族考古》第1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
- [74] 防城考古工作队：《山东费县防故城遗址的试掘》，《考古》2005年第10期。
- [75] a. 罗森：《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从青铜器看西周》，见《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三联书店，2011年。
b. 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变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见《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c. 罗泰：《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器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见《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四），1997年。
d. 曹斌：《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 黄卫东）